

張家山漢簡《蓋廬》研究

邵鴻 著



文物出版社

華夏英才基金支持出版

張家山漢簡《蓋廬》研究

邵 鴻 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設計：周小玮

責任印製：張道奇

責任編輯：李 睿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張家山漢簡《蓋廬》研究/邵鴻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5010-2213-7

I. 張… II. 邵… III. 漢墓-竹簡文-研究-江陵縣
IV. K877.5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7) 第 145076 號

張家山漢簡《蓋廬》研究

邵 鴻 / 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市東直門內北小街2號樓)

郵編: 100007

http : // www . wenwu . com

E - mail : web @ wenwu . com

北京京都六環印刷廠印刷

新 華 書 店 經 銷

850 × 1168 1/32 印張: 3.25

2007年11月第1版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2213-7 定價: 25圓

序

1983 年底至 1984 年初在湖北江陵發掘的張家山 M247 墓，為西漢早期墓葬，該墓出土的多種竹簡中，有兵書《蓋廬》一種。2002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張家山漢墓竹簡 [二四七號墓]》一書刊佈了此兵書之全文，並有整理小組所作釋文與註釋。此後，已有數位學者對《蓋廬》作過研究，或綜論之，或討論其內涵的某一方面，使這部失傳多年的古代兵書之學術價值初步明朗。

但是現在看來，對此篇兵書的研究有這樣幾個問題似還有著重討論的必要：其一是，整理小組所作釋文與註釋雖提供了經過整理的資料，為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礎，但仍有一些問題值得商榷。而且作研究的諸家也在一些詞句的解釋上有異見，需要論辯。這種討論，關乎對所研究的資料自身的理解，屬於基礎性的研究工作，自應格外重視。其二是，這篇兵書的思想成份，究竟反映了哪種學術流派或哪一些流派的思想，這不僅涉及對這篇兵書性質的理解，也關乎深化對當時兵書內涵的認識與對戰國時不同流派的軍事、哲學、政治思想之間關係的認識。其三是，此篇兵書成文年代尚需要再斟酌。這個問題的探討有利於搞清此篇兵書的形成過程，

並可由此進一步瞭解其他相關歷史文獻的成文或成書過程，這是歷史文獻學很重要的研究內容。

邵鴻先生的這部著作《張家山漢簡〈蓋廬〉研究》即是應以上所歸納的對《蓋廬》研究之幾點需要完成的。全書包括兩部分，前面是對此篇兵書的有關問題的綜合論述，後面是對《蓋廬》全篇的釋文、註釋與譯文。書中有不少創獲，而其主要學術貢獻，我以為有如下幾方面：

一、《蓋廬》的釋文，在 2002 年刊佈時，有一些疏誤，近年來學者們（包括本書作者在內）已就此做出訂正，提出了不少較好的意見，但 2006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張家山漢墓竹簡 [247 號墓]》的修訂本（下稱“修訂本”）時，仍沿襲 2002 年文本，未做改正。本書的《蓋廬》釋文則提供了一個經過詳細訂正的文本，這一釋文除了反映作者本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外，也較全面地吸收了其他學者的正確意見，無疑非常有益於從不同角度出發需要瞭解此篇兵書內容的讀者。

二、《蓋廬》文句、詞語有不少難解之處，脫漏文句之現象亦存在，本書對全文的註釋及在此基礎上所作的釋文及譯文，在以往研究者所做工作的基礎上，糾正了一些讀法與理解上的錯誤，提出不少新見。僅以《蓋廬》“黃帝之正天下也”至“治為人長久”一小段文字而言，即可以看出作者在這方面用力之勤。例如黃帝征天下“太上用意”很難解釋，作者認為“意”即《禮記·禮運》鄭玄註所云“心所無慮也”，是指黃帝“以玄默治國”，並指出“意”、“義”上古音不同，不宜讀“意”為“義”；“建執四輔，及皮（彼）大極”，作者讀“及”為本字，取其“至”意，不取“及”讀“立”之

說；“維斗為擊”，據兵陰陽家習語糾正了修訂本釋“擊”為“繫”之不妥。凡此，均考證有據，持論平允。類似創獲，書中還有多處，讀者自可檢閱。此外，作者還根據文中的數詞，揭示出簡文中若干處脫句的情形，疏通了閱讀此文之障礙。

三、對於《蓋廬》的思想內涵，學者們基本上都認為是兵陰陽家的作品，但作者通過深入剖析這篇兵書的全部思想內涵，認為《蓋廬》思想成份並不單一，除具有濃厚的兵陰陽家的色彩外，尤其推崇黃帝，以黃帝之道為其論述的出發點，顯然受到黃老之學的深刻影響。至於此篇兵書中言及“刑罰為末，德政為首”，強調以“德”攻暴救亂，則又是典型的儒家思想。所以，作者認定《蓋廬》實際上可以歸屬《漢書·藝文志》所著錄之雜家《伍子胥》八篇中之一篇。這一看法為以往研究者所未言，亦是本書之獨到見解。

四、對於《蓋廬》之成文年代，研究者間認識有較大差距。作者精心分析簡文語句，認為其既引用成書於春秋末而流行於戰國的《孫子兵法》文句，又引用戰國中期以來流行的屬黃老之學的黃帝書，文中還批評在前三世紀才出現的“自立為王者”為“毋德”，由此得出《蓋廬》成文不會早於戰國中期的結論。這一看法，與李零先生所主張，我國兵書的經典化主要完成於戰國時期；特別是戰國中晚期的見解（《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第十一講“簡帛古書導讀五：兵書類”附錄一“兵書的起源”，三聯書店，2004年）是相合的。作者並據此提出，《蓋廬》是後人借伍子胥名義所撰，實屬戰國時託名古代聖賢之風氣，但此一兵書仍為研究伍子胥的軍事思想提供了可供參考的資料。這些判斷建立於非常有邏輯的推理基礎

上，有相當的說服力。

五、作者評價此篇兵書的學術價值，指出其具有涉及較廣，而又簡明扼要、小而全的特點，可以說是一本簡明的戰國軍事學讀本，有豐富中國古代軍事思想與文化的不可忽視的價值。這篇兵書強調政治是軍事勝負的先決條件，在戰術上，強調進攻與戰機的捕捉，主張示形誤敵，疲敵而後擊之等等，從中可以使我們更深刻地體會戰國時期的軍事思想。這一總體上的認識與評價，應該說是相當客觀的，這與上述幾項研究工作一樣，都體現了作者治學的嚴謹。

以上僅約略地談了一下我初步閱讀這部書稿後的幾點看法。近年來，伴隨著藏於地下的戰國至三國的簡帛資料之眾多新發現，簡帛研究成為一門方興未艾的顯學。將資料與傳世典籍相聯繫，促進了歷史文獻學、中國古代史、哲學史、政治思想史、軍事思想史及古文字學等多個學科領域的進展。而對簡帛內涵研究的深刻與否，又必然與研究者在上述各學科專業的造詣有直接關係。邵鴻先生攻先秦史出身，而且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即一直關注兵書與陰陽家的研究，發表過多篇有關論文，故本書對《蓋廬》的研究，能夠刊正以往研究成果中一些疏誤，並在對其思想內涵的深入闡釋方面取得上述新的成績。當然，對《蓋廬》的字詞考證與思想內涵尚有一些難點需要繼續思考。謹祝作者在簡帛學與古代兵書及軍事思想史方面不斷有新的研究成果問世。

朱鳳瀚

2007年3月

目 錄

序	(1)
第一章 《蓋廬》研究	(1)
第二章 《蓋廬》釋文	(27)
第三章 《蓋廬》註譯	(33)
主要參考文獻	(77)
後記	(84)
《蓋廬》圖版	(87)

第一章 《蓋廬》研究

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在江陵張家山清理了三座西漢初年的古墓，編號分別為M247、M249、M258。其中M247出土竹簡一千餘枚，內容為多種漢律律文、文書和算數書等。其中還有很重要的一種，就是兵書《蓋廬》。200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一書，公佈了該墓所出的包括《蓋廬》在內的八種資料，為有關研究提供了基本條件。

隨之，海內外學者對張家山漢簡進行多方面的探討，成果頗為豐富。可能屬於佚失了一千多年的《伍子胥兵法》的《蓋廬》，也受到了學術界的關注。中國大陸的曹錦炎^①、田旭東^②、李銳^③、

① 曹錦炎：《論張家山漢簡〈蓋廬〉》，《東南文化》2002年第9期。

② 田旭東：《張家山漢簡〈蓋廬〉中的兵陰陽家》，《歷史研究》2002年第6期；《試析張家山簡〈蓋廬〉中的兵陰陽之術》，《秦漢史論叢》第九輯，三秦出版社，2004年。

③ 李銳：《張家山漢簡〈蓋廬〉散割》，見簡帛研究網站 www.bamboosilk.org。

劉釗^①、王貴元^②、連劭名^③、吳容曾^④、孫尊章^⑤、李靜^⑥、劉樂賢^⑦，臺灣地區的岑丞丕^⑧、許學仁^⑨等學者，先後在學術刊物或網絡上發表文章和公佈研究所得，對《蓋廬》的作者、成書時間、文字內容和思想特徵等進行了初步的探討和梳理。他們的工作，多有獨到高明之見，為正確解讀《蓋廬》提供了路徑和方便，但同時，學者間也仍然存在着諸多分歧，文本中的許多語句也還難以釋讀。2006年5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的釋文修訂本，《蓋廬》的釋文和註釋基本沒有變化。另應提到陳宇的《伍子胥兵法破解》一書^⑩，雖然從專業古文獻研究的角度來看，該書的學術價值似較有限，但仍是目前有關《蓋廬》研究的唯一

- ① 劉釗：《〈張家山漢墓竹簡〉釋文註釋商榷（一）》，見簡帛研究網站 www.baamboosilk.org；《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3年第3期。
- ② 王貴元：《張家山漢簡字詞釋讀考辨》，《鹽城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
- ③ 連劭名：《張家山漢簡〈蓋廬〉考述》，《中國文物》2005年第2期。
- ④ 吳榮曾：《蓋廬初探》，見儒藏網站 www.ruzang.net。
- ⑤ 孫尊章：《試論張家山漢簡〈蓋廬〉在歷史詞彙學上的價值》，《龍巖師專學報》2004年第4期。
- ⑥ 李靜：《〈張家山漢簡·蓋廬〉虛詞研究》，《和田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5年第4期。
- ⑦ 劉樂賢：《談張家山漢簡〈蓋廬〉的“地幢”、“日幢”和“日白”》，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⑧ 岑丞丕：《張家山漢簡〈蓋廬〉校釋補正》，www.ccs.ncl.edu.tw/news79/page52.htm。
- ⑨ 許學仁：《張家山 M247 漢簡〈蓋廬〉篇釋文訂補》，謝維揚、朱淵清主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
- ⑩ 陳宇：《伍子胥兵法破解》，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

專書。筆者研究古代兵書有年，對《蓋廬》也曾涉及^①，深感對於這一著作的研究還有很多工作可做，因而試圖在學界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對《蓋廬》做進一步的探索和討論。

一

《蓋廬》共有竹簡五十五枚，現存約計二千零八十九字（含合文十三字，據上下文可補足十字，局部因竹簡斷爛有不詳闕字）。全文共分九章，系以蓋廬和申胥對話、蓋問申答的形式寫出。蓋廬，即吳國君主闔廬或闔閭，銀雀山漢墓所出《孫子》佚篇《見吳王》闔閭亦寫做蓋廬。申胥，古籍中一般作伍子胥，即伍員，惟《國語》寫作申胥，《越絕書》、《孔子家語》、《鹽鐵論》等古書有時亦作申胥。伍子胥因何或以申為氏，史書中有兩種說法，一見於《國語·吳語》韋昭註：“（伍）員奔吳，吳與之申地，故曰申胥。”當代學者多引韋說為釋。然《說苑·奉使》云：“昔者，荆平王為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發乞食於吳，闔閭以為將相，三年將吳兵復仇乎楚。”是則伍員在楚已有申氏。考《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子胥祖父伍舉娶于申公子牟，二人皆因事流亡國外，後因有人為伍舉說項，楚“複其爵祿而複之”。但古籍中沒有子牟歸國的記載，有可能伍舉歸國時，子牟的申邑亦歸之，故伍氏也可以申為氏了。《說苑》成書早於《國語註》很

^① 邵鴻：《張家山漢墓古竹書〈蓋廬〉與〈伍子胥兵法〉》，《南昌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蓋廬〉劄記》，《中國文字學報》2005年第2期。

多，且內容多有所本，因此其說可能性似乎更大。

《蓋廬》以“蓋廬”名篇，實際上卻是“伍子胥”述其兵學。按照古代對話體著作的通例，本書更應該稱為《申胥（伍子胥）》，像《太公》、《吳子》、《文子》、《鶡冠子》等均其例。《戰國策·齊策》：“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廬、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呂氏春秋·尚德》：“闔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可見戰國人是把闔廬視為名將的，當時也必有托其名的兵書存在。但本篇以“蓋廬”名篇，則當如李學勤先生所說：“原來古書常取書的開首詞語用作標題。給竹簡加標題的人見篇首‘蓋廬’字樣，就標上‘蓋廬’，是很自然的。”^①

伍子胥的生平人所熟知，不必贅述。他雖是悲劇性人物，然長於智謀軍略，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呂氏春秋·尊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可見他在吳國的地位很高。正在他“亟肆以罷（疲）之，多方以誤之，既罷（疲）而後，三軍繼之，必大克之”^②的戰略思想指導下，吳軍才取得了對楚國九戰九捷、攻克郢都的大勝。對於他的軍功和軍事思想，後人評價很高，如《國語·吳語》：“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文選》卷四十四《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昔夫差承闔廬之遠跡，用申胥之用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唐《李衛公問對》甚至說古今兵法“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可謂推崇到

^① 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75頁。

^② 《左傳·昭公三十年》。

了極點。正因為此，戰國秦漢以來一直有稱名伍子胥的兵法流傳，《漢書·藝文志》著錄有《伍子胥》兩種，唐代尚有《伍子胥兵法》一卷存世，見於《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然而很不幸，這些著作均已散佚，只是賴《史記》、《漢書》、《文選》等書的註釋以及《太平御覽》、《武經總要》等書的記載，我們才能看到“伍子胥兵法”的隻言片語。然而，《蓋廬》的發現，使我們今天終於有幸一睹伍氏兵法的真容。

作為漢代的竹簡本，與《蓋廬》最可能有關係的當然是《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兩種伍子胥著作。《漢志》“兵家類”兵技巧家有《五（伍）子胥》十篇，圖一卷；雜家亦有《五（伍）子胥》八篇，班注云：“名員，春秋時為吳將，忠直遇讒死。”

所謂兵技巧家，班固曰：“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簡言之，就是專門講求軍事技能技巧和器械設施的兵家門派。這十篇本的《伍子胥》早已不存，不過，在漢代以來古籍中有一種屢被引用的《伍子胥水戰法》，則很可能與之有關。

《太平御覽》卷三一五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法：大翼一艘，廣丈六尺，長十二丈，容戰士二十六人，櫂五十人，舳艫三人，操長鉤矛斧者四，吏、僕射長各一人，凡九十一人。當用長鉤矛、長斧各四，弩各三十四，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文選》卷二十二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侍游曲阿後湖》註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

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同書卷三十五張景陽《七命》註引文稍異而略簡，書名亦作《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內經》。又《漢書·武帝紀》註引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伍子胥書》有下瀨船。”《武經總要》前集卷十一《水戰》：“春秋時，吳以舟師伐楚。又越軍、吳軍戰於江，伍子胥對闔廬以船軍之教，北陸軍之法：大翼者，當陸軍之車；小翼者，當輕車；突冒者，當行樓車；橋船者，當輕足驃騎。”《陣記·技用》：“昔伍員教闔廬以舟師之戰，大翼者當軍車，小翼者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有樓者當樓車，走舸者當驃騎，然後退鉤進拒之法以著。”後數條引文沒有明言屬於《伍子胥水戰法》，從內容上看卻很相近，應係出自同源。

從這些引文可以看出，《伍子胥水戰法》大致敘述了水師戰船的種類、作用、裝備、士兵配置，以及有關戰術等問題。中國早期兵書很少有論述水軍作戰方法的，故《伍子胥水戰法》顯得十分寶貴，伍子胥也因此被視為水戰鼻祖。如《太白陰經·水戰具篇第四十》：“經曰：水戰之具，始自伍員以舟為車，以楫為馬。”這個說法當然是不正確的，中國古代水軍的歷史應比這早得多，^①伍子胥的地位卻由此可見，這當然和伍子胥曾對強大的吳國水軍的建設有重要貢獻有關。《伍子胥水戰法》是相當典型的兵技巧家言，又被臣瓚稱為出於《伍子胥書》，所以極有可能就是《漢志》兵技巧家的

^① 如《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記載楚國以舟師伐吳，就比伍子胥活動時間要早數十年。

十篇本《伍子胥》中的文字。它們曾被採入《越絕書》中，但已不見於今本。大概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古代曾有人認為《越絕書》是伍子胥所撰。《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正義》：“《七錄》云《越絕》十二卷，或云伍子胥撰。”按《越絕書》保存有部分戰國以來的文字，最後編定於東漢^①，說它是“伍子胥撰”當然是錯誤的。將《伍子胥水戰法》與《蓋廬》比較，二者的內容全然不同，顯非一書，因而《蓋廬》不可能屬於兵技巧家的十篇本《伍子胥》，這是目前多數學者所公認的^②。

《漢書·藝文志》“雜家類”的八篇本《伍子胥》，也早已佚失。它和《蓋廬》有沒有什麼關係呢？有論者認為《蓋廬》是兵書，因而和雜家的《伍子胥》沒有關係，如吳榮曾先生就說，該書與《漢書》著錄的兩種《伍子胥》均不同。但我認為未必如此。

在回答這個問題以前，我們要先來討論一下《蓋廬》的內容和特點。

顯而易見，《蓋廬》具有濃厚的兵陰陽家的色彩。所謂兵陰陽家，《漢書·藝文志》有經典的解說：

“（兵）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師古曰：“五勝，五行相勝也”），假鬼神而為助者也。”

① 參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七；陳橋驛：《關於〈越絕書〉的作者》，《杭州大學學報》1979年第4期。

② 唯一的例外是李家浩先生。李先生在《讀張家山竹簡〈蓋廬〉劄記一則》（見《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五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中說：“兵技巧《伍子胥》十篇中，可能有《蓋廬》篇。”

用現代的話來說，兵陰陽家就是專門講求順應陰陽時令，按照天道運行、天象指示和五行相剋原理，以及借助鬼神從事作戰的兵學流派。總的來看，兵陰陽家是陰陽五行學說在軍事理論上的應用和發展^①。班固所述，實際上並沒有統括所有的兵陰陽內容，像卜筮、望氣、祭祀、禳祝、詛咒、占夢、厭勝等許多術數行為，其實也都被廣泛地用於軍事，亦可以歸入廣義的兵陰陽家範疇。但“天官時日陰陽向背”^②之說，則確為戰國秦漢時期兵陰陽家最基本的內容。《蓋廬》的第一至五章，論所謂“順天之道”，“用天之八時”，“日有八勝”，“用五行勝”，“（用）四時勝”，“用五行之道”、“用日月之道”、“用四時之道”等作戰方式和注意事項，正是典型的“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之說。而第六章前一部分敘述戰場望氣之法，也是兵陰陽家的看家本領之一。^③另外在全書的最後，附抄有“季春庚辛，夏壬癸，秋甲乙，冬丙丁”十三字，也是講衝剋日忌（“日衝八日”）的陰陽五行術數文字。所以，《蓋廬》總的來說屬於兵陰陽家色彩較為濃厚的兵書，這是沒有問題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人心目中，伍子胥正是一個陰陽家大師。在《越絕書》和《吳越春秋》等書內，描述伍子胥

① 參看拙作：《春秋軍事術數考述》，《南昌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兵陰陽家與漢代軍事》，《南開學報》2002年第6期。

② 《尉繚子·天官》。

③ 必須注意到，《蓋廬》說軍氣和絕大多數古代軍氣古文有所不同，它不是以陰陽五行來解說雲氣之象，占卜吉凶，而是敘述如何根據敵軍上方的塵埃和氣息判斷敵軍狀態和動向，屬於經驗判斷而非術數推斷。但在古代，這也仍然屬於軍事望氣術的內容。

善於占候的文字非常之多。如《越絕書·外傳紀策考》載，伍員初到吳國，就曾根據星相和望氣斷定吳國未來堪憂。又載攜李之戰前夕，夫差得惡夢而恐駭，伍子胥則以“越在南，火；吳在北，水。水制火，王何疑乎”之類的解說勸說夫差再戰。《吳越春秋·闔廬內傳》記伍子胥為吳國規劃建設都城，“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徧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之八風，水門八，以法地之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閭門者，以象天門，通閭闔風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闔闔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閭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並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鱈，以像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吳也。”同書《勾踐入臣外傳》載伍子胥以式法占斷，阻止夫差釋放勾踐歸國。更值得注意的是《越絕書·外傳記軍氣》一篇中，有所謂“子胥相氣取敵大數”，詳述青黃赤白黑五色氣在敵軍之上的吉凶和戰法，乃是研究古代軍事占氣術的寶貴資料。可見在古代，伍子胥被認為精通占星、望氣、五行、相夢、勘輿、厭勝、式占等多種術數，十分了得。魏晉以來，多有託名伍子胥的陰陽家著作見於著錄，如《伍子胥式經章句》、《遁甲決》、《遁甲文》、《遁甲孤虛記》等^①，也反映了伍子胥作為術數家的歷史影響。而《蓋廬》的出土進一步證明，至遲在漢初，伍子胥已經具有兵陰陽家大師的基

^① 見《隋書·經籍志》。